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11卷） 第1期 高等教育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Feb.2009,Vol.11,No.1

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机理释义及其调谐

□张立新 王雅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从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机理看，教育的社会功能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故应对之加以调谐，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与社会和谐互动。而教育和社会的主体是人，两者互动的中介也是人，两者的互动域是人的生活世界，两者发展的最终目标都在于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生活教育模式可以作为教育与社会互动的调谐器。

[关键词] 教育；社会；互动机理；生活教育；调谐
[中图分类号] 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9)01-0099-05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是教育学和教育经济学研究得出的普遍观点。教育学认为“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又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1]教育经济学认为，所有的教育回报率都为正数。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经典分析和研究都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预设，那就是“教育作为既定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并围绕社会总体目标运行”。此外，这种普遍观点中的“发展”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而随着社会发展理论的进展，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演化。例如，我国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内容，强调以人为本。因此，“教育促进社会发展”这一命题不是绝对的和普遍成立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以便更好地促进和保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诸多构成要素之一，与其他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正如有学者所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当我们回顾人类教育发展历程的时候，往往很难从中剥离出独立的、脱离多样化社会关系的教育主题。”[2] 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也指出：教育与社会的各子系统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教育的发展受社会各子系统的制约，同时它又对各子系统具有反作用。但是这种互动作用是非线性的，具有复杂的内在机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相关论述中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系统是由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文化观念结构及其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3]。在马克思看来，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的上层建筑构成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文化观念结构。即：社会主要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及其相互联系构成的。本文拟把教育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媒介系统，分析教育与社会三大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机理，探寻教育与社会之间和谐互动的“调谐器”。

二、教育与社会三大系统之间的互动机理

（一）教育与经济互动的内在机理

教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表现为教育活动涉及了构成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的生产力系统和生产关系系统。首先，教育活动涵盖了生产力系统的多种要素，并具有创新生产力的能力。生产力中属于独立实体性要素的部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与教育活动密切相关。在劳动者方面，马克思曾说过：“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4]即教育能生产和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有革命性的因素。在劳动资料方面，

[收稿日期] 2008－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4ASH001）；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HZG166）
[作者简介] 张立新（1977–）男，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雅林（1941－）男，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产出的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劳动对象方面，教育所产出的高质量人才和科学技术正在不断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中的非独立的、附着性和渗透性的要素，被称为“第一生产力”，而且科学技术的“物化”过程也在使生产资料不断扩展，变得日益复杂化和精密化。此外，教育本身也是从事知识这种经济因素生产与传播的产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产业部门，这又使教育具有了更多的生产力属性。

生产力系统反过来对教育活动的开展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教育所培养出的生产者所持有的思想观念会通过社会政治结构影响教育的目标和行为，尤其是教育生产的管理者会直接影响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力度。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对象的扩展，又对新型劳动者和新技术产生需求，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教育的目标、类型、结构、规模、速度、内容和方法等。因此，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会给教育注入诸如资本和体制等方面的活力，并对教育的发展在人才培养、科研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进而推动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次，由于教育活动中涉及到多种生产力要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特点和属性。所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统一关系可推知，教育活动与生产关系系统之间也存在本质的必然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复杂的，具有网状交织的特征。

从教育系统内部看，教育生产力决定教育领域的生产关系。从外部看，教育通过对人才培养的控制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服务，其服务效果可为正亦可为负，当教育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其效果为正，反之为负。教育的生产力属性对生产关系也有一定的决定作用。教育通过增加人们适应社会需求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资源的配置能力）而改变人们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这种地位的改变直接冲击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进而改变产品的分配关系，改变生产中人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竞争性流动的社会中，教育促进社会分层的作用非常明显，其与生产关系系统的联系亦显而易见。在赞助性流动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教育具有维持特定阶层特定地位的功能，所以也具有维护现有生产关系的功能。

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首先通过影响教育领域的生产关系而反作用于教育生产力。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看，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教育领域的利益格局、教育体制、规模、结构、速度、发展方向和形式，最终决定教育的需求与供给。经济基础的变更会带来教育领域或快或慢的变革，教育领域的利益格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的教育制度和发展理念会取代旧的教育制度和理念。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通过政治结构影响教育的发展。例如，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阶级不仅具有和获得一定的教育权和受教育权，而且把他们的利益和愿望通过对教育结构的规定表现出来。

（二）教育与政治互动的内在机理

教育具有政治功能，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制。教育对于人们政治态度、价值观的灌输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教育具有模式维护功能，能够维护现有的政治结构，为政治发展奠定重要的环境和社会基础。教育传播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受教育者形成适应和拥护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培养人们在知识技能等方面适应社会结构中的相应位置，使之成为现有政治体系的合格公民；培养和选拔各领域的领导者和管理人才，成为统治阶级利益的接班人、代言人和拥护者，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稳定；其次表现在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功能。教育具有一定的再生产政治结构的功能。社会政治结构是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教育是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一个必要因素。教育不仅仅传播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观，还创造和传播促进政治变革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发现和肯定自我价值，表达政治见解与意愿的能力，从而通过政治代理人的不断更新再生产阶级结构。教育具有的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功能再生产了人们的政治地位，从而也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力量。正如韦伯所说：“正式的教育是建立等级地位、形成等级生活的重要基础，不管人们的阶级地位（基于财产的地位）如何不一致，但是如果因教育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其等级地位就是相同的。”[2]此外，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理念和传统也在推动政治民主进程和政治变革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政治是统治阶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教育发展的大环境和强制性力量。虽然政治和教育都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政治是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对教育等其他上层建筑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政治

结构制约教育的目标、标准、结构以及受教育者的流动方向和流动速度。政治结构决定人才的选拔标准，在任人唯亲、任人唯学位、任人唯贤三种不同选拔标准的社会里，教育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会有所差异，各阶层的受教育权利也会不同。政治对教育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人们的教育权利，教育的方针、政策、目标，教育的投资主体，甚至明确教育要为政治当局服务。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也会影响教育的发展状态。当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时，政治对教育的控制和干预力度就大，教育的自主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学术自由和个性发展就会受到压抑；而分权的政治体制仅从宏观上调控教育的发展，提倡学术自由，注重个性的发展，注重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对教育的不适度地介入可能会触及两者相容的底限，从而引发教育与政治的紧张关系。

（三）教育与文化互动的内在机理

相对于政治、经济来说，教育与文化之间“具有潜在的和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既是内部关系，又是外部关系”。[5]“内部关系”是指文化潜存于教育系统之中，同时又以知识的形态“显性地”体现在教育的内部。“外部关系”是从文化与教育作为社会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的角度来说的。文化是沟通内外部关系的桥梁与媒介。教育与文化之间的双重关系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作用也是相互的，作用效果也具有正负双向性。“一方面教育要受社会的文化的制约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对教育的制约和教育对经济、政治的作用一般要通过文化的折射，文化成为教育与经济、政治等关系的中介。”[5]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具有的文化传承和创造功能，是文化变迁的核心力量。在文化传承与创造的过程中，教育根据需要来选择和整合文化。在人才培养上，教育要选择符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并选择符合学生个性要求的方式因材施教。选择的主要方式是作为主体的教师和学生通过选择合适的课程和教材等实现。在文化的传播方面，除了学校育人过程中的文化知识传授以外，教育更多地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对文化进行选择，引领社会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在文化的创造方面，教育要优先选择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文化方向进行探索。科学研究是教育创造新文化的直接的和主要的途径。教育实践是一种相对间接的方式，实践中容易形成新的文化。校风和办学传统就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不断选择和创新的结果。同时，教育对文化选择、传承和创新的效果又受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制约。因为，不同性质的社会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所需要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既有文化是人类文化再发展、再创造的基础，同时也可能成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束缚者”。这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文化传统两者对教育改革的反映是否一致。两者一致时，文化传统对教育改革就有促进作用；两者冲突时，文化传统就成为阻碍力量。由于文化具有弥散性，无处不在，所以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是全面的，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诸如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理念等等。文化不仅直接作用于教育，提供教育内容的来源，并深藏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理结构中，成为具有内在制约作用的强大力量；它还作为政治、经济系统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教育。因此，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又是深入的，其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它把教育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具有内在动力，而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对教育所产生的促进或抑制的作用。文化的来源也是文化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传统的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具有惯性，是持久的，很难突破。儒家文化对今天教育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行区域的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例如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西方文化冲击所至。

三、教育与社会和谐互动之调谐

由以上分析可知，教育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功能，兼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包含或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素。它本身就含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此，也包含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内容成分。所以，教育作为社会整体系统的内核之一，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但该发动机不仅能带来正面效应，也能带来负面效应。比如：一个过大而不适当的教育结构很可能导致失业问题，甚至经济危机；教育既可促进社会公平，也可导致社会不平等。笔者不敢妄言教育会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可以肯定的是，教育的不适当发展会给社会带来问题甚至危机。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不仅仅是教育一厢情愿的事情，教育也并不会自动地导致社会发展，还需要社会各子系统的

配合，需要一定外力的调控，即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和协调发展需要调谐。这就需要从本质上寻找因应之策。笔者认为，要促进教育与社会的和谐互动，首要的是必须处理好以下两对关系：

教育的依附性和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教育的依附性是指，教育要素渗透于经济、文化、政治等子系统中，并因此产生对社会各子系统的依赖，尤其是对各种资源的依赖。由此产生的观点是，教育应依附于其他子系统，尤其是政治。教育的独立性是指，教育作为传播知识和追求自由与真理的事业，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价值观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独特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由前面的机理分析可知：教育的依附性和独立性是共存共生的，依附性是教育从外部汲取营养、交流信息并不断调整目标的需要；独立性是理性的教育活动植根于社会土壤的首要条件，象征着教育存在的合法性[6]。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互为基础，具有孪生性和相对性，缺一不可。正是由于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才使教育具有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自身发展的动力。正如有学者所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培养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经济角色、职位选拔和分配个人与群体的代理结构。这样，教育就成为社会变革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革力量，随着结构分化的发展，这个变量将成为一个能够促进或阻碍发展进程的准自主结构。"[7]因此，可以在依附性和独立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维持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正向互动条件，从而保证教育与社会在协调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

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工具理性强调功利性，关注的仅仅是客观存在的对象，忽视事物所内含的社会、历史、人类的意义。它强调手段和方法的合理性，而忽视目的本身的合理性。工具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至上。工具理性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规范有序的物化世界或机械世界。在工具理性主导的世界，将导致主体丧失自我、迷失人生的意义，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被物化，生活人被异化的人所代替。而价值理性强调终极目的和价值的合理性，关注对人自身的关怀，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对生活有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是人生存的价值基础和信仰的依据。价值理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人文精神，构建的是一个"人"的社会，一个有意义的社会。教育是始终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激荡中成长的，教育功利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它也不可能再回归中世纪时的"象牙塔状态"。所以，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共存的，试图规避两者中的任意一个都是徒劳的。教育的依附性使教育不由自主地具有了工具理性；教育的独立性又使教育力图确保价值理性的主导地位。所以，教育本身必须而且应该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也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与社会之间产生良性互动。教育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均衡统一体的构建在于：工具理性应以价值理性为导向，避免极端功利化的倾向；价值理性应以工具理性为支撑，为终极目的的实现提供有效和便捷的手段和方法。

"人"是教育与社会以及社会各子系统之间互动的中介。因此，无论教育的依附性与独立性，还是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要寻找它们之间的均衡点，就必须以"人"为切入点，即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和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人类的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于满足人的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活动的基础是人的生活世界，教育就是要满足人的生活的需要。因此，教育必须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与人们的生活的生产联系起来。所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需要的是一种"生活教育"。对于"生活教育"这一概念，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Life education means an education of life by life and for life."即"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而教育"[8]，"就是生活的改造"[9]，"就是社会的改造"[9]，其培养目标为：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10]。虽然陶先生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内容及观点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其最终目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致的。由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所以，生活教育就是而且必须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也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12]，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和"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13]。因此，我们认为，生活教育就是从真实生活世界出发，紧密结合社会实际、生活实际，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宗旨，引导和促进受教育者主体意识的成长与发展的教育形式。其价值在于使教育者自觉地体现人的生存意义，让人真正地以人的样态生活。即让人明白为何而生的道理，并让人掌握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技

能，从而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为生技能的掌握首要的是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培育人的创新精神，激发人的自觉和自由的本性，使人具有独立人格，具有改造自然和自身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仅内存于人的思想观念之中，还要融入到社会生活中。生活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提高人的生产劳动的能力，而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一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生活教育能够承担起促进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责任。至此，生活教育也就自然地具备了调谐教育与社会和谐互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

综上所述，生活教育实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实现了理性与现实的统一，实现了知与行的统一。它恰恰是教育的依附性与独立性、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点，是教育与社会和谐互动的调谐器。生活教育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都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现实和长远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不断赋予生活教育以新的内容，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教育和社会改革，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 新编高等教育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

[2]刘精明. 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83.

[4]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5.

[5]潘懋元. 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213，193.

[6]张启树. 论教育活动的相对独立性[J]. 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9（6）：7-11.

[7]T 胡森. 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第三卷）[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1：95.

[8]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1卷）[M]. 成都：四川出版社，1992：124.

[9]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2卷）[M]. 成都：四川出版社，1992：435，128.

[10]徐明聪. 陶行知评传[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273.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13]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159.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 & Society and Its Tuning

ZHANG Li-xin WANG Ya-l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s social function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djustm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harmoniously. The subjects of education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two are all human being. The interaction area is the living world. And the ultimate development goals of both education and society are to satisfy the living need of individual and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Therefore, the model of life education can be used as a tuner to adjus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Key words education; society; interaction mechanism; life education; tuning

编辑 刘 波